



# 缘起

佛教譬喻文学的流变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T AVADĀNA LITERATURE

范晶晶 著

中西書局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缘起：佛教譬喻文学的流变 / 范晶晶著. —上海：  
中西书局，2020.10  
ISBN 978-7-5475-1755-0

I. ①缘… II. ①范… III. ①佛教文学—文学史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I207.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20 ) 第 177254 号

---

---

---

## 缘起——佛教譬喻文学的流变

范晶晶 著

---

责任编辑 刘寅春

助理编辑 姚骄桐

装帧设计 王轶颀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 ( www.zxpress.com.cn )

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 邮编 200040 )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40 000

版 次 2020 年 10 月第 1 版 202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1755-0/I · 210

定 价 60.00 元

---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电话：021-66366565

## 序

讨论佛经中的“譬喻”及譬喻故事的文章和书，已经有不少。我年轻的同事范晶晶，不久前完成了她的一部书稿：《缘起——佛教譬喻文学的流变》。书即将出版，晶晶希望我为她的新书写几句话。书稿的基础，是她此前完成的博士后报告，我看过，因此也可以说与我有一点“缘”，有此“缘起”，我答应了晶晶。但答应归答应，能够讲点什么却一直没想好，事情因此拖延到现在。但答应了的事，总得完成。我想了想，还是就佛经中“譬喻”及譬喻故事的研究，简单谈谈自己的意见。可以谈的内容有很多，这里只谈三条，包括两个问题，另加一点议论。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譬喻”作为佛经的一种文体，究竟怎么理解更好？佛经中有“十二分教”，“譬喻”是其中一个类别。但后来的研究显示，汉译佛经中的“譬喻”一名，既可以对应梵语的 *avadāna* 或者巴利语的 *apadāna*，也可以对应梵语的 *nidāna*，也就是“十二分教”中所谓的“因缘”，有时甚至可以对应 *itivṛttaka*，即“十二分教”中的“本事”。因此，今天要讨论的“譬喻”，尤其是汉语背景下的“譬喻”，要比“十二分教”中讲的“譬喻”宽泛得多，囊括的范例显然也更广。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学者在范围尺度的把握上也不一样。这些情况，范晶晶在她的书里都做了比较详细的分

析，同时她还依据国际上对以佉卢文书写的犍陀罗语佛经写本的最新的研究成果推进了她的分析，认为犍陀罗语佛经中一个新见到的词语 provayoge/pruvayoge，即梵语的 pūrvayoga 和巴利语的 pubbayoga，意思是“宿业”或“前世故事”，与 avadāna 相配合，前者作为一个类型，处理前生的故事，后者则处理现世的故事。范晶晶认为，犍陀罗语佛经中这些故事，“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与后世梵语、巴利语中的譬喻故事有共通之处”。晶晶的这些意见，不能说完全是新发现，但她确实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了。

但我以为，问题的解决还可以做更多的考虑。众所周知，这些犍陀罗语佛经，来自阿富汗及巴基斯坦，是最近二十多年来在佛教和佛教研究方面最大的发现之一，虽然大多是残本，但这是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佛经写本，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一二世纪之间，体现了早期佛经形态的很多特点。那么，梵语、巴利语的佛经中所有的譬喻故事，是不是都来自犍陀罗语佛经呢？原则上讲，梵语佛经的出现的确比犍陀罗语佛经要晚一些，但巴利语佛经就不一定了。而且，这类问题还需要考虑到地域的因素，即使是主题相同或相类似的譬喻故事，可以因袭，也可以在同样的印度文化背景下，平行发展。因此，“共通之处”一词，写得有分寸。可是如果讲来源，则要复杂得多。依我之见，佛教譬喻故事的来源不一，无论是从故事情节和角色，还是叙事的框架，乃至文体的风格与语言来看，中间既有印度自古流传的各类民间故事，也有后来逐步加入的，多少有些历史依据，但更多则是演绎的所谓“历史故事”，再有与早期佛教的“佛本生”故事相类似的一类故事，还有与后来大乘佛教的出现密切相关的所谓“佛传故事”。所有这些，可以说也是各种因缘，汇集一处，相

互影响，相互勾连，最后蔚然成为今天称作佛教譬喻故事的大观。几种语言和类型的佛经中的譬喻故事相互之间的关系很有意思，确实也很值得做更深入的研究。

犍陀罗语佛经中的譬喻故事，在文体形态方面对前世和现世做了比较明确的区分，provayoge 只讲前世故事，而 avadāna 则只讲现世故事。范晶晶提出：“这种区分引人注目。从单一的时间维度发展到两世甚至三世说，是否与说一切有部所提倡的‘三世实有’的思想倾向相关？只有在三世实有的框架下，因果报应才得以牢固确立。”从今天我们了解的印度西北以及中亚地区佛教发展的历史看，确实如此。作为说一切有部的譬喻故事集《撰集百缘经》，同时讲述前世故事、现世故事以及其间的因果报应关系，也体现了这个特点。但犍陀罗语的这批文献，依美国学者邵瑞祺（R. Salomon）及其团队的意见，很可能属于法藏部。法藏部并没有“三世实有”之说，晶晶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怎么理解 provayoge 与 avadāna 的相关性。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历史上法藏部确实没有提出过“三世实有”的说法，但认为一切众生都有前世、今世和来世，这本身就是印度宗教文化的基本理念之一。佛教认可和继承了理念和说法，讲“轮回”，而且一直讲。没有三世，众生如何“轮回”？法藏部作为佛教的一个部派，历史上又与说一切有部曾经是一家，后来才分开。因此，法藏部佛经中的譬喻故事，在文体上做出“前世”和“现世”的区分，其实不奇怪。

总体而言，我完全同意晶晶在书中所做的结论：“无论如何，这种现象至少说明：早期譬喻故事集的内容结构，并非像后世那样整齐划一。”晶晶的研究和我这里做的补充的共同点在于，都说明了问题

的复杂性。

其次是第二个问题：十年前，我曾经在一个讨论佛教历史、文献与文学的学术研讨会上，提交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譬喻师与佛典中譬喻的运用》，其中问到一个问题，佛教历史和佛经中讲到的“譬喻师”（Dārṣāntika）作为一种身份时，究竟应该怎么理解？传统的，也是普遍认同的看法是“譬喻师”就是说一切有部中的“经部师”（Sautrāntika），二者同义。但我怀疑，所谓“譬喻师”，在更早的时候，是佛教僧团中的一类人，他们讲经，其间编撰新的经典或者改造此前流传的经典，在新的经典中引入大量的譬喻故事，以譬喻作为弘教说法的手段，因而得到了这个名称。“经部师”的名称，出现得比“譬喻师”晚，二者有关系，把二者等同起来则是后来的事。

我当时有这样的设想，主要是因为早期佛教的巴利文经典里，对于一些僧人，有“经师”（Suttantika）、“持律师”（Vinayadhara）、“说法师”（Dhamma-kathika）以及“持法师”（Dhammadhara）等名称；在印度巴赫特（Bharhut）发现的最早的佛教碑铭中，有“持藏者”（Peṭakin）、“经师”（Suttantika）、“讽诵者”（Bhāṇaka）、“长部讽诵者”（Dhīgha-bhāṇaka）、“中部讽诵者”（Majjhima-bhāṇaka）、“诵法师”（Dhamma-bhāṇaka）这样一些名称；其他早期的佛典中，也能见到“阿毗达磨者”（Abhidharmika）和“阿笈摩师”（Āgamaka）等名称。这些名称，分别指的是佛教历史上某一类在讽诵和传承经典中具有专业分工特点的法师。“譬喻师”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因为譬喻，如果他们讲经中譬喻的特色不突出，他们怎么会被称作“譬喻师”呢？佛教历史上的“譬喻师”，显然与今天讲的佛教譬喻文学最为相关，对于佛教譬喻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他们曾经有过突出的贡献。

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断或者说假设，其中一些细节还有待论证。我的观点与通行的说法不一致，提出来，是希望能引起更多的讨论。晶晶的书，与我讨论过的问题相关，因而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说几句。

第三点不算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点想法。范晶晶的书，书名中的“缘起”二字，让我想到我们今天时常提到的“缘”字，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字。我说有意思，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佛教传到中国之前，汉语中有“缘”字，也有“起”字，但没有“缘起”，佛教传来之后，古代译经的僧人把两个字合起来，翻译出《缘起法颂》：“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为传达佛教的“缘起说”，汉语中便有了“缘起”一词。“缘起说”是佛教理论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其中的道理说复杂似乎复杂，说不复杂其实也不复杂，但的确体现了佛教的智慧，传到中国，为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增加了全新的内容。人生在世，际遇难测，大千世界，变化无数，万事万物，细究起来，不是都互相关联的吗？彼由此起，此为彼因，不就是世上事物的一种常态？说简单或者朴素一些，我以为这是认识人生和宇宙的一种体验。说复杂一点，由佛教发展为“缘起说”，其中的道理，虽然未必所有人都认可，但我认为大致不误。对于信仰或者接近佛教的人来说，从“缘起”可以讲到“十二因缘”，再进一步可以讲到“四谛”，整个佛教的理论，甚至都可以说以此作为出发点，“缘起说”的重要，由此可见。

有意思的还有第二个方面，从“缘起”的理论得到启发，或者也可以说由于佛教的影响，从东晋南北朝开始，中国的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出现了许多以前没有的文学作品，从鲁迅说的“释氏辅教之书”，到陈寅恪所说的“本为佛教经典之附庸，

渐成小说文学之大国”的志怪小说、传奇、变文，再到宋元直至明清，以“缘”为名，讲因果报应、三世轮回的各类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话本、戏曲、弹词，林林总总，蔚为大观。范晶晶的研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对此做了很详细的讨论，书名“缘起”，不仅表达恰如其分，实在也是“点睛”之语。

以上拉拉杂杂，已经讲了不少，大都是从晶晶书的内容引起的一些想法。希望我说的这些，不只是对晶晶已有研究成果的肯定，也是在跟她做一种研究细节上的讨论。

范晶晶的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加上博士后，都在北京大学完成。她聪明好学，做事中规中矩，一直是一位好学生。后来入职，成为我的同事，到今年刚好是第五年。依我看，她一直努力，工作认真，学术上已经做出了一定的成绩，现在的这本新书就是证明之一。相信她依然会精进不已，也相信她今后会在研究上取得更多的成就。人生是“缘”，我们的“缘”，就在学术，我虽老矣，仍愿意与晶晶共勉。

王邦维

2020年10月8日在敦煌改定



# 目录

序	1
绪论 十二分教中譬喻的兴起与研究史：文献整理、影响 研究与多学科并进	1
一、对印度-伊朗语族譬喻类佛典的整理、校勘、 翻译与研究	6
二、对汉译譬喻类佛典的翻译与研究	21
第一章 佛教譬喻文学源流	27
第一节 与譬喻文献相关的思想：轮回、业报与宿命智	29
一、轮回学说的萌芽与发展	30
二、业报：印度宗教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	34
三、宿命智：对轮回、业报的洞察	39
第二节 犍陀罗语譬喻类文献：譬喻的初期形态	46
一、犍陀罗地区的譬喻师与当地传统	47
二、体裁的逐渐定型与口语的灵活性	51
第三节 梵语譬喻类文献：佛教叙事文学的宝库	65
一、avadāna 词义探源	65

二、经、律中散见的譬喻故事选集：《天譬喻》	70
三、木鹿的譬喻故事集：纲要本	72
四、《撰集百缘经》：独立成熟的譬喻故事集	74
五、各类譬喻藤、譬喻鬘：韵文化的改写	77
第四节 巴利语譬喻类文献：量少而精的选集	81
一、巴利语 <i>apadāna</i>	82
二、巴利语故事集《譬喻》( <i>Apadāna</i> )	83
三、相关文献：《天官事》( <i>Vimānavatthu</i> ) 与 《饿鬼事》( <i>Petavatthu</i> )	88
第五节 于闐语譬喻类文献：折衷、生动的改编	91
一、《阿育王譬喻》	95
二、《迦膩色迦譬喻》	98
三、《难陀譬喻》	100
四、《爱情故事》	103
五、《善财譬喻》、于闐语《罗摩衍那》故事与 《本生赞》	104
第六节 汉译佛典中的譬喻类文献：从风格多样到两世 因缘的主旨	106
一、汉译譬喻类经典举要	110
二、汉译譬喻类文献的价值：譬喻文体的发展与 史料宝藏	116
第二章 汉译譬喻佛典的本土化：从释氏辅教之书到因缘 变文、文人诗笔	121
第一节 从印度的譬喻师到汉地的唱导师	123

一、印度的譬喻师：撰集、宣讲譬喻故事	124
二、唱导师：从印度的咒愿颂佛到汉地的 身兼譬喻师之职	127
三、汉地的“譬喻-唱导师”：道纪及其《金藏论》	133
第二节 六朝志怪与史书中的业缘思想	138
一、譬喻对志怪类灵验故事的影响	138
二、从刘阮故事看遇仙类型的佛教化与业缘说	142
三、轮回因果说对正史书写的渗透：失衡中的平衡	148
第三节 敦煌文献中的譬喻故事选集与因缘变文	153
一、譬喻故事的选编本、简编本与纲要本	154
二、因缘变文：对譬喻文体的突破与汉化	162
第四节 唐代诗文中的三生缘会：乱离中的寄望	170
一、元白交游圈的前生、后世之念	170
二、三生石的传说：生死不渝之义	175
三、小民的愿望：重结后身缘	181
第三章 轮回因缘结构对俗文学的全面渗透	187
第一节 宋、元以降的说因缘（果）：对俗讲的继承 与发扬	189
一、两宋时期的说因缘（果）：劝善话本	190
二、元明清时对俗讲说因缘的继承：故事宝卷	193
三、元明清时广义的说因缘（果）：文学作品中的 记录	198
第二节 话本小说、杂剧戏曲中的两世相逢	205
一、苏轼的前后身：词场好话柄	205

二、度柳翠的传说：悟前世、了尘缘	211
第三节 讲史话本、小说中的转世与下生：教化与捏合	216
一、因果相循、眷属相随	217
二、捏合幻化：结构的勾连	222
第四节 明代的主情派与女性作家的创作：从“因缘” 到“姻缘”	229
一、夫妻姻缘与怨家相逢	231
二、女性作家群体的创作与弹词中的“姻缘”	237
第四章 中国古代士人对轮回因缘说的接受及其 社会效用	245
第一节 从“怀此恨其谁诉”到“生生世世宿因缘”	247
一、“三世之事，信而有征”	252
二、春秋笔法：对轮回因缘说的矛盾心态	256
第二节 轮回因缘说的社会效用	261
一、说因果，勸善良，结善缘	262
二、个人层面的改恶向善与心理抚慰	267
三、从表演到阅读：“灵晕”的丧失	269
余论 “缘”——一种文学类型的跨文化迁徙	273
一、“缘”构成一种文学类型吗？	279
二、“缘”对古代长篇小说的兴起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	288
参考文献	295
后记	319

绪论

## 十二分教中譬喻的兴起与研究史： 文献整理、影响研究与多学科并进



早在 1928 年，陈寅恪先生在《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中就已指出：

至《灭罪冥报传》之作，意在显扬感应，劝奖流通。远托《法句譬喻经》之体裁，近启《太上感应篇》之注释。本为佛教经典之附庸，渐成小说文学之大国。盖中国小说虽号称富于长篇巨制，然一察其内容结构，往往为数种感应冥报传记杂糅而成。若能取此类果报文学详稽而广证之，或亦可为治中国小说史者之一助欤！<sup>①</sup>

1930 年，他在《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一文中进一步阐发此理，认为《法句譬喻经》等佛经的体制，乃是“引故事以阐经义”，而故事根据演讲的场合有所变化，若能溯其本源、分析结构，则可窥见时代风气、作者技能，对于研究小说文学史或许有帮助。在文章开篇，陈寅恪先生通过自己阅读敦煌卷子的体验，推论道：“宋代说经与近世弹词章回体小说等，多出于一源，而佛教经典之体裁与

---

<sup>①</sup> 原载《北平图书馆月刊》一卷二号，1928 年 1 月，后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 290—292 页。郑阿财先生在《敦煌写卷〈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初探》（收入柳存仁等著，《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天津出版社，1996 年，第 581—601 页）一文中具体分析了《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对志怪小说、话本小说与善书的影响。

后来小说文学，盖有直接关系。”<sup>①</sup>此言不虚。尽管陈先生在两篇文章中分析的主要是故事内容，但也已经指出了佛经体裁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之大。或许还可加上一句，尤其是其中的譬喻类文献。

王邦维先生近年在《譬喻师与佛典中譬喻的运用》一文中也进一步提倡：

由这些譬喻师编撰或在他们影响下出现的佛教经典，在此期间大量地传到汉地并被翻译出来，对中国佛教乃至于一般世俗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古时期文学史的学者们在这方面已经找出了不少事例，但这些事例最早从哪里来，怎么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最后怎么演变为中国本土的文学故事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中间显然还有好些问题值得我们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sup>②</sup>

因此，溯源佛经譬喻类文献及考察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是很有必要的。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本书试图探讨当譬喻类文献作为印度佛教“十二分教”的有机组成部分被译介到汉地后，是如何进入各种故事集、类书，再发展为敦煌讲唱文学的热门题材，影响到宝卷、弹词的结构形式，并经由说因缘（果）等活动，渗透进入诗文、小说、戏剧的广阔天地的。正如张沛先生所言，在当代的学术语境下进行历史比较研究，必须在关注事实联系的同时，“不再把作家、文本或话语视为单一

---

<sup>①</sup> 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1930年8月，后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7—223页。

<sup>②</sup> 原载《文史》2012年第3辑，第221—230页，后收入王邦维等编，《佛教神话研究》（中西书局，2013年）与氏著《华梵问学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



的、静止的、封闭的、本质主义的实体，而是作为某种‘差异的内在发生’或文化变异现象、某种效果历史、某种延异活动加以剖析”。<sup>①</sup> 譬喻类文献从印度到中国、将近两千年的发展演变轨迹——从最初游离的异文化因子，逐渐被本土化，最终影响到整个俗文学的格局，并形成一种新的文学类型——正反映了这样一种文化变异的历史过程。

譬喻作为一种体裁，乃是佛教文献中的一个类别。在四部阿含（āgama）、五部尼迦耶（nikāya）、三藏（pīṭaka）的分类法之外，还有“九分教”与“十二分教”的分法。其中，巴利语佛典与大众部的律典中出现的是九分教：经（sutta）、祇夜（geya）、记说（veyyākaraṇa）、伽陀（gāthā）、优陀那（udāna）、如是语（itivuttaka）、本生（jātaka）、方广（vedalla）、未曾有法（adbhūta-dhamma）。十二分教中则加上了因缘（nidāna，音译尼陀那）、譬喻（avadāna，音译阿波陀那）与优波提舍（upadeśa）。十二分教的提法主要出现在法藏部的《长阿含经》、说一切有部的《中阿含经》与《杂阿含经》、大众部的《增一阿含经》以及法藏部的《四分律》与根本说一切有部的《毗奈耶杂事》等文献里<sup>②</sup>。那么，譬喻何时被纳入了佛教的十二种主要文献体裁？

在汉译佛典中，譬喻与同为十二分教之一的因缘有时相混，原因之一或许在于：从宽泛意义上讲，二者都是故事<sup>③</sup>。例如《撰集百缘

① 张沛主编，《比较文学基础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4页。

② Charles Willemen, et al. *Sarvāstivāda Buddhist Scholasticism*. Brill, 1998, p. 7, note. 35.

③ 《大智度论》介绍了十二分教，其中，“尼陀那者，说诸佛法本起因缘，佛何因缘说此事；修多罗中，有人问故，为说是事；毗尼中，有人犯是事，故结是戒。一切佛语缘起事，皆名尼陀那。”（CBETA, T25, no. 1509, p. 307, b5-8）可是对阿波陀那却语焉不详，仅仅称其为“与世间相似柔软浅语”，没给出明确的定义，只是举了几个例子，说明哪些经典是阿波陀那。狭义的因缘还可以指说法的背景，即时间、地点、人物等要素。

经》的梵语题名为 *Avadānaśataka*，严格的对译应该是《百譬喻经》，但古人将 *avadāna* 翻译为“缘”<sup>①</sup>。又如《杂宝藏经》基本上是一部譬喻、本生故事集，但每一个故事的标题都以“缘”结尾。《贤愚经》又称《贤愚因缘经》。题支谦译《菩萨本缘经》，梵本已佚，学者们一般将其梵语经题构拟为 \**Bodhisattvāvadānasūtra*<sup>②</sup>。换句话说，印度佛教中的 *avadāna* 类文献，在汉译佛典中有时译为“譬喻”，有时译为“(因)缘”。

以下将对譬喻体裁的研究史作一简要梳理。

## 一、对印度-伊朗语族譬喻类佛典的整理、校勘、翻译与研究

### (一) 对写本的整理、校勘与翻译

19 世纪初，英国驻印度、尼泊尔官员何德逊 (Brian H. Hodgson) 开始收集当地的梵语、藏语佛教写本，并着手开展相关的研究。1828 年，他在《尼泊尔与西藏的语言、文献与宗教札记》一文中谈到佛教文献的“十二分教”，其中对因缘 (*nidāna*) 的定义是：交代事件的原因；对譬喻 (*avadāna*) 的定义是：关于行为的果报与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法则。他将《大事》(*Mahāvastu*)、《譬喻二十二则》(*Dvāviṃśati-avadāna*，实际上有二十四则)、《天譬喻》(*Divyāvadāna*) 等都定性为“论”(*avadāna śāstra*)。此外，他还指出了佛教中的譬喻

---

① 正是由于这一译名上的混淆，密多罗 (Rajendralala Mitra) 在首次整理尼泊尔写本的 *Avadānaśataka* 时，将其对应的汉译本错误地判定为求那毗地所译《百喻经》，只因比尔 (Beal) 在 *Catalogue of the Buddhist Tripiṭaka* 中将后者的梵文经题拟为 *Śatāvadāna Sūtra*。参见 Rajendralala Mitra, *The Sanskrit Buddhist Literature of Nep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1882, p. 17.

② Martin Straube, “Narrative: South Asia.” *Brill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 vol. 1, 2015, pp. 498—506.

与婆罗门教中的业报（karma vipāka）类典籍的联系，后者处理的也是因果报应的主题<sup>①</sup>。

在尼泊尔收集到写本以后，何德逊将这些写本提供给时任法兰西学院梵文教授的布奴夫（Eugene Burnouf）。后者在这些写本的基础上展开了大量的翻译和研究工作。1844年，布奴夫出版《印度佛教史导论》（*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书中也提及譬喻类佛典。他主张譬喻主要与戒律有关，应该属于律部，而非经部。在谈到十二分教中的譬喻时，他认为将譬喻类经典与果报联系在一起并不精确。尽管譬喻类经典多为解释前世的业与今世的果，或预言今世的业与后世的果，但 avadāna 的本义只是传说（légendes, récits légendaires）。虽然在这类经典中比喻手法的运用很常见，其实 avadāna 的本义与比喻关系也不大。至于十二分教中的因缘，布奴夫提出尚未见到以因缘作为佛经题目的用例，故而得出结论：nidāna 的本义是原因、缘由，后来引申为表示佛经中讲述事件原由的部分。因缘其实并不构成佛典的一个类别，而仅仅是佛经的一个组成部分<sup>②</sup>。他还翻译了《天譬喻》与《撰集百缘经》中的一些故事。

密多罗（Rajendralala Mitra）受托整理何德逊寄到孟加拉亚洲学会的一批佛教写本，于1882年出版相应的成果，即《尼泊尔梵语佛教文献》一书，其中包括大量的譬喻故事。在序言中，密多罗延续了

---

① “Notices of the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of Nepal and Tibet”，后被收入文集 *Essays on the Languages,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of Nepal and Tibet*. Trübner & co., 1874, pp. 15—17。以下人名的汉译均参考李四龙著《欧美佛教学术史：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一书。

② 此处参照英译本。Eugene Burnouf,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trs. Katia Buffetrille and Donald Lopez J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p. 88—89, 104—109。

布奴夫的观点，认为作为道德训诫故事的譬喻，主要代表的是律部文献<sup>①</sup>。他还指出，在尼泊尔文献中，本生故事往往也被编进譬喻集中。另外，密多罗也翻译了大量譬喻故事的梗概。

在何德逊收集的写本之外，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赖特（Daniel Wright）与贝德尔（Cecil Bendall）搜集到的写本，意义也极为重大，其中包括了不少本生与譬喻故事的梵语写本。《天譬喻》、《撰集百缘经》、《譬喻精华集》（*Avadānasārasamuccaya*）、《菩萨喻如意藤》（*Bodhisattvāvadānakalpalatā*）等譬喻故事集的梵语精校本所依据的底本，大部分来自这批藏品。

1886年，高威尔（Edward B. Cowell）与尼尔（Robert A. Neil）基于赖特从尼泊尔获得的三种写本、何德逊寄到巴黎的数种写本、圣彼得堡藏的一种写本，出版了《天譬喻》的梵语精校本，直到现在依然是学者们研究《天譬喻》的基础文献。

1891年，费尔（Leon Feer）以来自尼泊尔的梵语写本为源本，出版了《撰集百缘经》的法语全译本，并在“导论”部分对譬喻类经典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介绍<sup>②</sup>。他通过分析 *avadāna* 的梵语本义及其藏译、汉译等，指出对这一概念进行翻译的难度：汉语中有三个术语与之对应，“譬喻”“出曜”与“因缘”。“出曜”译其本义，而“因

---

<sup>①</sup> Rajendralala Mitra, *The Sanskrit Buddhist Literature of Nepal*. p. xli. 此处密多罗因袭了布奴夫的一个错误认识：尼泊尔梵语佛教写本中没有律部文献，因此大批的譬喻故事代表的是律部的面貌。但实际上，《大事》即大众一说出世部律的一部分。关于这一点，参见 Vincent Tournier, “The *Mahāvastu* and the Vinayaṭika of the Mahāsāṃghika-Lokottaravādins.”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2012 (15), pp. 87—104.

<sup>②</sup> Leon Feer, tr. *Avadāna-śataka, cent légendes (Bouddhiques)*. Ernest Leroux Éditeur, 1891, “Introduction”, pp. iv—XXXVIII.

缘”则与十二分教中的“因缘”重合。费尔由此认为译作“譬喻”最合适，但不足在于“譬喻”一词的外延太广，包含了三种不同的含义：比喻（comparaison）、寓言（apologue）与体裁（genre）。他对譬喻文体的定义是：将现世命运与前世所为（“业”）生动地联系在一起；现世被认为是前世的结果。因此，所有的譬喻基本上都由两个故事构成：现世的事件及造成现世事件的前世因缘。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有能力看到这一联系，唯有具备宿命智的佛陀才能知道前世的造业，然后提出相应的教诫，就如同寓言故事中的道德训诲。一则譬喻由四个部分组成：一、序言，交代地点环境；二、现世的事件，可以由任何人讲述；三、前世的因缘，由佛陀讲述；四、结论，佛陀提出相应的道德训诫<sup>①</sup>。佛经中有许多故事都遵循这一模式。费尔反对布奴夫将譬喻归入律部的说法，而是从其形式出发，认为譬喻应该属于经藏的一种。譬喻中将现世遭遇与前世因缘联系在一起的做法，使其成为单独的一个类别。

此外，费尔还指出了譬喻与十二分教中其他两种类别的联系：本生（jātaka），主人公为佛陀的譬喻故事成为本生<sup>②</sup>；授记（vyākaraṇa），将前世因缘替换为来世果报，亦即指出今世造业与来世果报之间的联系，这类譬喻故事则成为授记。但与此同时，他认为将 vyākaraṇa 译为“授记”（prédiction）是不太准确的，其梵语原义

---

<sup>①</sup> 这一定义为后来研究譬喻文献的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直到 20 世纪末犍陀罗语譬喻故事的发现。

<sup>②</sup> 实际上，除了这种人物上的差异之外，譬喻故事在内容上也体现出与本生故事不同的特点。本生故事主要突出佛陀舍身为入、舍身求法的一些极端虔诚的行为。而譬喻故事针对的则是一般大众，其奉法行为要温和、可效法得多，比如烧香供养、礼敬佛塔之类，主要提倡对佛、法、僧的供养布施，以及由此带来的福报；反之，如果生性吝啬，不肯供养佛、法、僧，就会遭受恶报。

是“解释”(explication, *déclaration*)；由于这类故事解释的是今世行为与来世得道之间的联系，故而被译成“授记”。因其间错综复杂的交叉关系，费尔总结了譬喻的五种变体：严格的譬喻（前世故事与现世结果），本生譬喻，仅有现世结果的譬喻，授记譬喻，前世、现世、来世的综合譬喻。因此，广义的譬喻定义如下：譬喻就是使用事例证明因果联系的教法（instruction）。除了梵语譬喻类佛典外，他还关注到了巴利语三藏中的譬喻类别，即《小部》中的 *Apadāna*。

1906—1909年间，史拜雅（Jacob S. Speyer）出版了《撰集百缘经》的梵语精校本，将其定义为小乘佛典。在精校本第2册（1909年）的前言中，他大体上同意何德逊对十二分教中譬喻的定义，即以果报为主题的一类佛典。他所举出的例证是，梵本《撰集百缘经》中一半的故事都是以如下句子结尾：“因此，众比丘，纯黑业有纯黑果报，纯白业有纯白果报，杂业有杂果报。故而众比丘，要远离纯黑业与杂业，勤修纯白之业。众比丘，你们应当如此学习。”这段套话不见于汉译《撰集百缘经》，却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中很常见，义净将其译为：“是故苾刍！汝等应知，若纯白业得纯白异熟，若纯黑业得纯黑异熟，若黑白杂业得杂异熟。汝诸苾刍当舍纯黑业及以杂业，于纯白业当勤修学。”《天譬喻》中往往也有类似的表达<sup>①</sup>。

史拜雅反对布奴夫将 *avadāna* 译为“传说”，其理由是：在正统的佛教徒看来，*avadāna* 绝不仅仅是故事或传说，而是佛陀的教法。不过，他将此类教法归为次等文献，针对的是普通民众，并无思想性与

---

<sup>①</sup> 从文本的发展历程来看，《撰集百缘经》的汉译本要早于目前所见到的梵本，故而并无这段内容。鉴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与《天譬喻》中也经常出现同样的套话，或许说明这是譬喻故事发展到成熟期后的一种固定表达。

哲学性，故而被巴利语文献的九分教分类法排除在外。史拜雅同意费尔所提出的本生与譬喻的亲缘关系，但也强调了二者的区别：本生的故事内容主要是菩萨的舍生取义，而譬喻则强调对于僧团的供养。此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他区分了三类譬喻：一、散见于经藏、律藏中的譬喻故事；二、专门的譬喻类经典；三、后起的、经文人加工的譬喻故事集，如各种“譬喻鬘”。史拜雅在校勘中使用了多种对应的平行文本，如《如意树喻鬘》( *Kalpadrūmāvādānamālā* )、《宝喻鬘》( *Ratnāvādānamālā* ，或作 *Ratnamālāvādāna* )、《阿育王喻鬘》( *Aśokāvādānamālā* )、《百业》( *Karmaśataka* )、《花耳譬喻》( *Vicitrakarṇikāvādāna* ) 等，其中不少尚未整理出校本，史拜雅的校注为研究者提供了相关的信息。

在史拜雅与高威尔校本的基础上，毗底耶 ( Vaidya ) 于 1958 年、1959 年分别又重新出版了《撰集百缘经》《天譬喻》的梵语新校本，但只是对之前的校本略有修正，并未引入新的写本材料，故而没有太大的独立参考价值。

19 世纪末，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巴利语《譬喻》( *Apadāna* )。爱德华·缪勒 ( Edward Müller ) 于 1893 年出版《长老尼偈注释》时，注意到其中大量征引《譬喻》，就在“导论”中对此有所论述，并撰写了相关文章。1911 年，伯德 ( Mable H. Bode ) 发表《护国譬喻》的校译研究，在脚注中说明自己正在为巴利圣典协会整理《譬喻》的校本。1922 年，她在去世前将未竟的工作转交给李理 ( Mary E. Lilley )。后者于 1925 年、1927 年出版了《譬喻》的上、下两册校本。但这一校本所依据的底本有限，校勘者本人也不甚满意，学界对其评价不高。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英文全译本，相关的研究不是

很多，值得一提的有两部博士论文：1993年梅利柯（Sally Mellick）向牛津大学提交的《巴利语〈譬喻〉选集精校与翻译》（*A Critical Edition, with Translation, of Selected Portions of the Pāli Apadāna*）与2015年克拉克（Chris Clark）向悉尼大学提交的《〈譬喻〉研究：第二、三、四章校译》（*A Study of the Apadāna, Including an Edition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Third and Fourth Chapters*），两位论文作者也分别撰写了相关的研究文章。一般认为，巴利语文献中的《天宫事》（*Vimānavatthu*）与《饿鬼事》（*Petavatthu*）亦属譬喻故事集。作为《小部》的有机组成部分，巴利圣典协会于1942年出版了《饿鬼事》的英译本，于1977年出版了《天宫事》与《饿鬼事》的校本。

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在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从新疆带回的梵语写本中发现作者为 Kumāralāta（鸠摩罗多，又意译为童受）的残叶，比定为汉译《大庄严论经》（*Kalpanāmaṇḍitikā/Kalpanālamkṛtikā*），于1926年出版残叶内容，并提出汉译者鸠摩罗什将作者误为马鸣。1927年，烈维（Sylvain Lévi）发表文章，认为该写本应该是童受的《喻鬘论》（*Dṛṣṭāntapaṅkti*），他不太相信熟悉北印度情况的鸠摩罗什会把作者弄错，故而推测该文本为马鸣所作，后经童受加工改编。随后，学者们继续探讨此问题，但并无定论。荒见泰史鉴于存在五年大会之类的北印度口头讲经场合，推测当时有不止一个抄本系统在流传。这样就能解释罗什将作者系于马鸣、窥基提到《喻鬘论》的时候完全没提《大庄严论经》的矛盾<sup>①</sup>，足备一说。

斯坦因（Aurel Stein）在中亚探险时，在吉尔吉特发现了大量

---

<sup>①</sup> 荒见泰史，《譬喻师鸠摩罗多与〈喻鬘论〉》，收入陈允吉主编《佛经文学研究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8—230页。



的梵语写本。杜特 (Nalinaksha Dutt) 于 1939—1959 年整理出版了四部九册校本。之后, 1959—1973 年, 维拉 (Raghu Vīra) 与钱德拉 (Lokesh Chandra) 父子出版了十册影印本。其中有部分譬喻故事写本, 时间大约在公元 5—6 世纪。目前发现有六个故事, 在《天譬喻》中都有对应的平行文本。1977 年, 哈特曼 (Jens-Uwe Hartmann) 以其中的《月光譬喻》为主题撰写硕士论文, 之后又发表相关文章, 并一直维持着对譬喻文献的研究兴趣<sup>①</sup>。1980 年, 松村恒 (Hisashi Matsumura) 重新整理校订了其中有藏译、汉译平行文本的四个故事——Māndhātāvādāna (古译“顶生”或“我养”)、Mahāsudarśanāvādāna (大善见)、Candraprabhāvādāna (月光)、Viśvantarāvādāna (古译“自在”), 提交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博士论文《吉尔吉特写本中的四个譬喻》( *Four Avadānas from the Gilgit Manuscripts* ), 并附有大量注释, 还收入了相应的藏译本与吉尔吉特写本《药事》中的平行文本。

1965 年, 在土库曼斯坦拜拉姆·阿里 (Bairam Ali) 附近的木鹿 (Merv) 绿洲发现了一批桦树皮写卷, 被送到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部 (现在的东方写本部)。2000—2002 年, 沃罗比耶娃-捷夏托夫斯卡娅 (Margarita Vorobyova-Desyatovskaya) 在《东方写本》( *Manuscripta Orientalia* ) 杂志上陆续发表了其中的譬喻故事部

---

<sup>①</sup> Jens-Uwe Hartman, “Notes on the Gilgit Manuscript of the Candraprabhāvādāna.” *Journal of the Nepal Research Centre*, 1980, pp. 251—266; “Zur Frage der Schulzugehörigkeit des Avadānaśataka.” *Zur Schulzugehörigkeit von Werken der Hīnayāna-Literatur*, ed. Heinz Bechert, Göttingen 1985, pp. 219—224; “Endangered by Man-eating Witches: a Fragment of the Sīṃhalāvādāna from the Turfan Finds.”《季羨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卷,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第 563—575 页。

分。2015年，辛嶋静志（Seishi Karashima）与沃罗比耶娃-捷夏托夫斯卡娅合作，推出了新的精校本，加上了详细的注释，并从内容、语言等方面对这批故事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sup>①</sup>。这批故事意义重大：语言中保存了大量的方言俗语，形式上是纲要本，在譬喻文献发展的历史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

1970年以降，德国与尼泊尔联合启动了写本保护项目（Nepal-German Manuscript Preservation Project），对尼泊尔现存的佛教写本进行拍摄并数据化。此后，基于一些新的写本材料，不少德国学者都对佛经中的叙事文献进行了校勘与研究工作，其中的一位核心人物是韩米夏（Michael Hahn）。他对诃利尊者（Haribhāṭṭa）与牧赐（Gopadatta）二人的同名著作《本生鬘》（*Jātakamālā*）进行了开创性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并于1982—2008年间主持“印藏丛书”（*Indica et Tibetica*）的编辑出版工作，支持出版了五十余册专著，其中不乏譬喻、本生故事的内容。除了他本人的作品之外，还有与人合作的成果，以及支持其他学者的成果。丛书第二册即克劳斯（Konrad Klaus）的《慈童女譬喻（〈天譬喻〉第三十八则）：梵本与德译》，第三册是韩米夏与克劳斯合作的《鹿本生（诃利尊者〈本生鬘〉第十一则）：研究、文本与词汇表》，第四册是斯里兰卡佩拉德尼亚大学汉杜鲁康德（Ratna

---

<sup>①</sup> 参见 M. I. Vorobyova-Desyatovskaya, “A Sanskrit Manuscript on Birch-bark from Bairam-Ali: II. avadānas and jātakas” 系列文章, *Manuscripta Oriental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Oriental Manuscript Research*. 2000. 6 (3) —2002. 8 (3)。以及 Seishi Karashima and M. I. Vorobyova-Desyatovskaya, “The Avadāna Anthology from Merv, Turkmenistan.” *Buddhis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 vol. 1. eds. Seishi Karashima, et al. Soka University, 2015, pp. 145—524。关于后文的介绍，参见陈明书评, “Seishi Karashima and Margarita I. Vorobyova-Desyatovskaya” ed., *Buddhis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 The St. Petersburg Sanskrit Fragments, Volume 1*,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六卷, 2016年。

Handurukande) 的《〈譬喻精华集〉五则占布体故事校译》。这里不一一赘述。韩米夏的学生辈也成果丰硕。斯特劳伯 (Martin Straube) 于 2006 年、2009 年分别出版了《善财紧那罗女譬喻》(*Sudhanakinnaryavadāna*) 与《菩萨喻如意藤》的研究著作。弗米加提 (Camillo Alessio Formigatti) 则对尼泊尔 14—17 世纪譬喻文学的再创作进行了专门探讨。2013 年, 阿斯普朗德 (Leif Asplund) 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诗王子譬喻〉的文本历史》(*The Textual History of Kavikumāravadāna*), 在致谢中也提到了韩米夏的指点。

于闐语文献中并无独立的譬喻故事集, 只有一些单行的譬喻故事。1942 年, 贝利 (Harold W. Bailey) 发表了《迦膩色迦》的于闐语文本与英译, 但尚未将其判定为譬喻。1966 年, 他又发表了《阿育王譬喻》的英译, 将其定性为“譬喻”。1970 年, 埃默利克 (Ronald E. Emmerick) 发表了《难陀譬喻》的英译。1997 年, 玛吉 (Mauro Maggi) 出版了被认为是譬喻的《爱情故事》的于闐语精校本与英译。此外, 于闐语《罗摩衍那》的故事也被划归为譬喻 (本生), 段晴先生于 2003 年将其译为汉语, 并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这是于闐语譬喻故事首次被译成汉语。2009 年, 玛吉在《前伊斯兰时代的伊朗文献》一书中的“于闐文献”一章中, 专辟一节对譬喻进行介绍。2013 年, 契阿拉 (Matteo de Chiara) 出版了《善财譬喻》的于闐语精校本与英译本。

20 世纪 90 年代, 在阿富汗发现了一批新的犍陀罗语佛教写本, 其中有一部分内容属于譬喻文献之列, 包括前生故事 (pūrvayoga) 与譬喻 (avadāna) 两类。围绕着这批写本, 首先有邵瑞祺 (Richard Salomon) 于 1999 年出版的一部概论性质的介绍性著作《犍陀罗古

代佛教写卷：英国图书馆佉卢文残卷》( *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andhāra: 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ī Fragments* )。具体到譬喻类经典，则有乐至 ( Timothy Lenz ) 于 2003 年出版的《犍陀罗语〈法句经〉新本与前生故事集》( *A New Version of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and a Collection of Previous-Birth Stories* )，该书的第二部分对犍陀罗语文献中的前生故事进行了专题研究，分析文本的作者、性质、形式、语言等方面的特征，并给出了十几个前生故事的翻译与注释。2010 年，乐至出版了《犍陀罗譬喻故事：英国图书馆佉卢文残卷 1—3，21 与增补残卷 A—C》( *Gandhāran Avadānas: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ī Fragments 1—3 and 21 and Supplementary Fragments A—C* )。在这部专著中，他对二十多个譬喻故事进行了转写、翻译与详细的注释。乐至以费尔与斯特朗 ( John Strong ) 的研究 ( 见下文 ) 为参照，提出犍陀罗语譬喻文献的独特之处：一方面，犍陀罗语文献中的所有譬喻及前生故事都出自两位僧人抄手，而这两位僧人似乎也只抄写了这批文献中的譬喻及前生故事，以此印证了斯特朗提出的存在单独譬喻师群体的说法；另一方面，无论是前生故事还是譬喻故事，都只涉及前生或现世一个时间维度，不像后世的譬喻文献那样同时揭示前生与现世的业报。这说明费尔基于成熟的譬喻故事集所下的关于譬喻的定义，并不适用于早期的譬喻故事。2018 年，邵瑞祺出版新著《古代犍陀罗的佛教文献：导论与选译》( *The Buddhist Literature of Ancient Gandhāra: An Introduction with Selected Translations* )，其中前生故事与譬喻故事各占一章。

2005 年，塔特尔曼 ( Joel Tatelman ) 出版了《天譬喻》的英译选集——《天绩》( *The Heavenly Exploits* )，其中包括圆满譬喻、亿耳譬

喻、善财譬喻与摩健底迦譬喻。2008年与2013年，罗特曼（Andy Rotman）分别出版了《天譬喻》的英文全译本（*Divine Stories*）上、下两册。

《撰集百缘经》目前尚无英文全译本。阿普顿（Naomi Appleton）曾在杂志上发表过第二品和第四品的英译及相关研究。此外，她对第一至四品的英译与研究著作预计于2020年出版<sup>①</sup>。

## （二）综合研究

1860年，俄国学者瓦西里耶夫（W. Wassiljew）的佛教研究专著被译为德文，题为《佛教：教义、历史与文献》（俄文版1857年）。在谈到佛典的分类时，他认为首先出现的是经、律、论的三分，后来经部又被分为十二类。其中，祇夜（geya）与伽陀（gāthā）是以形式为标准划分的结果，其他数种则是以内容为标准进行区分：譬喻是一种传记（eine Art Lebensbeschreibungen）；因缘与自说（udāna）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佛陀经人询问才作的讲法，后者则是佛陀自说，二者与律部的关系更为密切。十二分教是一种后起的说法<sup>②</sup>。

1920年，纳瑞曼（G. K. Nariman）在撰写《梵语佛典文献史》时专辟一章介绍譬喻类文献。他指出：譬喻是介于小乘与大乘之间的一类佛典。在小乘经典中，已经出现了对佛陀的称扬赞颂和顶礼膜拜等内容，发展到譬喻时，更加上了许多夸饰与神话的元素。《撰集百

---

① Naomi Appleton,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Avadānaśataka*.” *Asia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vol. 1, no. 7, 2013, pp. 1—36; “The Fourth Decade of the *Avadānaśataka*.” *Asia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vol. 2, no. 5, 2014, pp. 1—35; *Many Buddhas, One Buddha: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Avadānaśataka 1—40*. Equinox Publishing Ltd, 2020 forthcoming.

② W. Wassiljew, *Der Buddhismus, seine Dogmen, Geschichte und Literatur*. tr. Anton Schiefner. Kaiserli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860, pp. 118—119.

缘经》每一品 (varga) 由十个故事组成, 遵循的是南传巴利语典籍 (vagga) 的传统。他还推测《撰集百缘经》很可能是最古老的譬喻类典籍<sup>①</sup>。

1940年, 培其尔斯基 (Jean Przyluski) 发表《譬喻师、经部师与说一切有部师》(“Dārṣṭāntika, Sautrāntika and Sarvāstivādin”) 一文, 讨论这三种称呼的内涵外延及其相互关系。延续这一话题, 1985年, 斯特朗发表题为《佛教譬喻师与长老优波崛多》(“The Buddhist Avadānists and the Elder Upagupta”) 的文章<sup>②</sup>, 深化了对史拜雅、毗底耶在其《撰集百缘经》梵语精校本中都曾征引过的《如意树喻鬘》两首偈颂的分析, 提出有一批僧人专门编撰、讲解譬喻故事, 即譬喻师 (avadānist)。这一发现大大推进了对譬喻文献的性质及其在佛教文献中地位的认识。斯特朗还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 即譬喻师与优波崛多 (Upagupta) 密切相关, 这也是他1992年出版的专著《优波崛多的传说与信仰》(The Legend and Cult of Upagupta) 的核心议题之一。王邦维先生于2012年发表的文章《譬喻师与佛典中譬喻的运用》, 是有关譬喻师与譬喻经典研究的又一力作。

1945年, 印度学者师青颈 (Sastri Nilakantha) 出版了一册小书《譬喻中的社会生活拾锦》(Gleanings on social life from the Avadānas), 从两部主要的譬喻故事集《天譬喻》与《撰集百缘经》中搜罗有关社会生活的材料, 如孩童的降生与教育、社会商业生活、理想的政

---

<sup>①</sup> G. K. Nariman, *Literary History of Sanskrit Buddhism*. D. B. Taraporevala Sons & Co., 1920.

<sup>②</sup> 两个不同的梵语词 dārṣṭāntika 与 avadānika, 译成汉语都是“譬喻师”, 具体的区分请参见第二章第一节“从印度的譬喻师到汉地的唱导师”。

治体制、种姓制度、宗教状况等。沿着这一思路，1985年，另一印度学者夏尔玛（Sharmistha Sharma）出版了《佛教譬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研究》（*Buddhist Avadānas: social-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study*）一书，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譬喻故事，更为详细全面地考察了譬喻故事中所反映的诸如政治状况、种姓制度、妇女地位、节日庆典等方面的内容。

进入21世纪，对譬喻文献的研究更加多元化。萧邦（Gregory Schopen）曾批评佛教研究中的“新教倾向”，即过于重视文本文献，而忽视考古、铭文材料。塔特尔曼则进一步指出，即使在文本文献研究中，也存在着偏见：重视历史、理性、哲学的材料，而轻视故事、传说、神话。他借鉴《圣经》叙事研究的方法，对《天譬喻》的第二个故事《圆满譬喻》进行了文学性的分析，在1988年硕士论文的基础上，于2000年出版《圆满的业绩：圆满譬喻的翻译与研究》<sup>①</sup>。刘易斯（Todd Lewis）对尼泊尔的譬喻故事传统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于2000年出版专著《尼泊尔的流行佛教文本：尼泊尔佛教中的叙事与仪式》（*Popular Buddhist Texts from Nepal: Narratives and Rituals of Newar Buddhism*），并发表了多篇有关尼泊尔譬喻文献的论文。此外，也有以形象学的方法对譬喻故事展开讨论的，如格林（Phillip S. E. Green）于2007年提交给佛罗里达大学的硕士论文《〈撰集百缘经〉中的女性形象》（*Female Imagery in the Avadānaśataka*）。罗特曼于2009年出版了《如是我见：早期印度佛教中对信仰的视觉

---

<sup>①</sup> 他在导论中声称要用文学批评的方法来分析文本，如同文学研究者分析康拉德或伍尔夫的小说一样。《The Glorious Deeds of Pūrṇa: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Pūrṇāvadāna. Delhi, 2001, p. 3.》

化》( *Thus have I seen: visualizing faith in early Indian Buddhism* ), 采用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史、影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对《天譬喻》中的故事进行解读分析, 着重探讨信仰生成过程中的视觉元素, 及其与布施、善业的关系<sup>①</sup>。还有一些学者采用文本与图像相结合的方法, 讨论譬喻、本生故事的文本与浮雕等艺术表现形式之间的源流关系<sup>②</sup>。

在叙事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 学者们开始更多地讨论佛经譬喻与本生故事中的叙事元素。2014年在维也纳召开国际佛学会( IABS )第17届大会, 就有一个分论坛以“佛教叙事类型”( *Buddhist Narrative Genres* )为主题, 会上阿普顿以《撰集百缘经》中的十个本生故事来讨论譬喻与本生文类之间的异同; 乐至提出后世对譬喻的定义并不适用于犍陀罗语写本; 穆尔顿-胡勒斯( *Karen Muldoon-Hules* )则以《撰集百缘经》中的丑女故事为例, 探讨譬喻故事从印度到中亚、汉地的传播与流变过程。另外还有两位学者谈到了藏语佛教文献以及泰国佛教文献对本生、譬喻故事的创造性改编。2017年, 穆尔顿-胡勒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专著《佛的新娘: 〈撰集百缘经〉中的比丘尼故事》( *Brides of the Buddha: Nuns' Stories from the Avadānaśataka* )。

---

<sup>①</sup> 作为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南亚语言文明系的博士, 罗特曼在研究方法上带有鲜明的芝大特色, 即重视采用社会学、人类学等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印度文献。他在2003年发表过一篇文章《实践的情色: 佛教譬喻文学中的客体与代理》(“*The erotics of practice: objects and agency in Buddhist Avadāna literature*”), 探讨净信( *prasāda* )产生的机制, 将其与看情色杂志、电影的过程作类比。

<sup>②</sup> 例如 Tianshu Zhu, “Reshaping the Jātaka Stories: from Jātakas to Avadānas and Prañidhānas in Paintings at Kucha and Turfan”.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29. 1 (2012), pp. 57—83. 该文描述分析了新疆克孜尔石窟中5—7世纪的作品对一些譬喻故事的图像表现。



## 二、对汉译譬喻类佛典的翻译与研究

几乎在对尼泊尔写本中譬喻类文献展开研究的同时，1859年，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也发现了汉译譬喻故事的宝库。他偶然接触到明代学者徐元太编撰的《喻林》二十四卷，就放下手中正在翻译的《大唐西域记》，从《喻林》所征引的十一部譬喻经——既有单行的《佛说箭喻经》《佛说群牛譬经》等，也有譬喻集《杂譬喻经》《百喻经》等——中选取了一百一十二个故事进行翻译。这些故事之所以引起儒莲这么大的兴趣，可能与当时的学术风气有关。一方面，本菲（Theodor Benfey）关于印度故事集《五卷书》的研究在欧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儒莲还曾与本菲讨论过相关问题。另一方面，尼泊尔写本的发现与其中包含大量譬喻故事的消息，儒莲不可能不晓。在这双重动力下，翻译《大唐西域记》之余，他开始了汉译譬喻故事的翻译<sup>①</sup>。

半个世纪后，1910—1911年间，沙畹（E. Chavannes）从《六度集经》《旧杂譬喻经》《杂譬喻经》《百喻经》《杂宝藏经》等十余种佛经中，选择了五百个譬喻、本生故事译成法文。在“导论”里，沙畹指出了这些故事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些表达一望而知是来自佛经，如“步步生莲花”“莲步”“金莲”等，源出鹿女夫人（因其步步生莲，又称莲花夫人）的故事。有些故事经过了改头换面的加工，需要仔细探究，如《续齐谐记》中的阳羨鹅笼故事，与《旧杂譬喻经》的第十八个故事很可能有亲缘关系。还有一种情况，在佛经译出之前，印度的民间故事可能已经通过某种方式传入中国了。如《淮南子》《魏略》

---

<sup>①</sup> S. Julien, *Les Avadānas, contes et apologues indiens*. B. Duprat, 1859, pp. vii—xvi.

中“牛蹄之涔”的比喻，以及《淮南子》中禹入裸国的传说（实际上，《吕氏春秋》里已有此说）。<sup>①</sup>

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学者意识到了佛教譬喻故事对志怪小说的影响。段成式在《酉阳杂俎续集》卷四中指出，吴均《续齐谐记》记录的阳羨鹅笼故事来自“释氏譬喻经”，“讶其说以为至怪也”<sup>②</sup>。然而，真正展开系统的研究，还是要等到现代学术兴起之后。1920年，梁启超先生发表《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认为“我国自《搜神记》以下一派之小说，不能谓与《大庄严经论》一类之书无因缘”<sup>③</sup>。1923年，鲁迅先生在《中国古代小说史略》中介绍了段成式的说法，明确《续齐谐记》中的鹅笼故事出自题康僧会译《旧杂譬喻经》，并进一步概述佛经中的这些故事对六朝志怪小说及一些释氏辅教之书的影响<sup>④</sup>。20世纪20—30年代，陈寅恪先生在留德回国后，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介绍佛教譬喻类文献及其对汉地世俗文学的影响，如《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等<sup>⑤</sup>。此外，他还指出了这些故事对后世小说、弹词等文体的影响。1928年，胡适先生出版《白话文学史》，专辟两章介绍佛教的翻译文学，特意举出擎钵喻与火宅喻的例子，并且总结了译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

---

① E. Chavannes, *Cinq cents contes et apologues extraits du Tripitaka chinois*. I—III. 1962, Reprint of the 1910—1911 édition. “Introduction”, pp. xiii—xv.

② 许逸民，《酉阳杂俎校笺》，中华书局，2015年，第1672—1673页。

③ 收入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0—158页。

④ 鲁迅，《中国古代小说史略》，收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3—61页。

⑤ 陈寅恪，《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27年第2期；《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0年第1期。梵本《喻鬘论》的整理者吕德斯，即陈寅恪在德国留学时的老师。陈寅恪后来关注譬喻故事，是否也受到了德国乃至欧洲学术的影响？

三大贡献，其一是佛经“往往带着小说或戏曲的形式”，“这种悬空结构的文学体裁，都是中国古代没有的；他们的输入，与后代弹词、平话、小说、戏剧的发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sup>①</sup>。之后的各种研究，大体上沿着这几位学者开拓的路径，在细节和案例上更加深入和丰富化。

1945年，《印度国际大学年报》(*Visva-Bharati Annals*)创刊，在第一期上刊登了两篇关于《撰集百缘经》的文章。其中一篇的作者是巴宙，他在简要介绍了梵本与汉译的情况之后，选译了十个梵本缺失或与汉译差异较大的故事。另一篇是印度学者师觉月(Prabodh Chandra Bagchi)的文章，通过对比梵本与汉译不一致的情况，例如增加的三种类型的套话、对第一百个故事的改写，从而判断梵本经过了根本说一切有部僧人的改编。这一观点为后来的学者所认可。<sup>②</sup>

1988年，孙昌武先生出版《佛教与中国文学》一书，在第一章“汉译佛典及其文学价值”中提到了“譬喻”与“因缘”。1989年，郭良鋈先生发表《佛教譬喻经文学》一文，对佛经譬喻类文献进行了全面的介绍。1996年，丁敏先生出版《佛教譬喻文学研究》，对佛经中的譬喻类文献展开了深入的专题研究。2004年，陈允吉先生主编《佛经文学研究论集》，其中有数篇论文都涉及譬喻类经典。2007年，陈洪先生出版《佛教与中古小说》一书，附录的四篇文章都是对譬喻类经典的考证与研究。2010年，李小荣先生出版专著《汉译佛典文

---

① 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24页。

② 参见 Fa Chow, “Chuan Tsi Pai Yuan King and the Avadānaśataka.” *Visva-Bharati Annals*, vol. 1, 1945, pp. 35—55; 以及 P. C. Bagchi, “A note on the Avadānaśataka and its Chinese translations.” *Visva-Bharati Annals*, vol. 1, 1945, pp. 56—61。文章信息承蒙社科基金匿名评审专家见告，特此致谢。

体及其影响研究》，第六、第七两章即是讨论汉译佛典中的“譬喻”与“因缘”及其影响。

在欧美国家，也有一些博士论文以汉译佛典中的譬喻经典为研究对象。2004年，麦斯西（Marion Meisig）出版了她的博士论文《佛教圣徒传记的起源：〈撰集百缘经〉的改编史研究》（*Ursprünge buddhistischer Heiligenlegenden: Untersuchungen zur Redaktionsgeschichte des Chuan tsih peh yüan king*）。2013年，约斯特（Tyson J. Yost）提交给康奈尔大学的博士论文《撰集的佛教徒：中国中古早期的譬喻叙事及其读者群研究》（*Anthologizing Buddhists: A Study of Avadāna Narratives and the Communities that Read The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主要以《杂譬喻经》和《众经撰杂譬喻》为考察文本，一方面借用文学理论中的分析工具，如印度文学中的滑稽味、叙事与话语的区分、近来对选集（anthology）研究的最新成果等，分析譬喻故事的叙事性与编撰过程。另一方面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如阐释群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文本的外在形态对接受态度的影响等，探讨这些文本的读者群体，最终从“选集”的目的得出结论：《杂譬喻经》主要以僧团为中心，而《众经撰杂譬喻》则以俗众信徒为中心。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不仅梵语、巴利语、犍陀罗语、于阗语文献中存在大量的譬喻故事，吐火罗语、回鹘语写本中也留存着譬喻故事或譬喻故事集，藏语佛典更是一座丰富的譬喻故事宝库。只是限于学力与时间，笔者未能作全面考察。或许可以寻找的一个借口是：这几种语言的譬喻类佛典时代都相对较晚，对汉地的影响相对也不是那么大。此外，到目前为止，关于譬喻类文献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

栋，上文也仅能选择被认为直接相关、有代表性的论作进行介绍。还有一点遗憾，由于各种条件所限，没能全面参考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只能留待日后弥补。同样，对譬喻进行研究的角度也可以很多样化，以下章节切入的视点主要取其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生关联之处，即前世今生的业报维度。